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批判理論的效果歷史－法蘭克福學派在台灣的接受史

The Effective History of Critical Theory: The Reception History of Frankfurt School in Taiwan

doi:10.7065/MRPC.201006.0111

哲學與文化, 37(6), 2010

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37(6), 2010

作者/Author：曾慶豹(Chin Ken Pa)

頁數/Page：111-12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7065/MRPC.201006.011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批判理論的效果歷史—— 法蘭克福學派在台灣在接受史*

曾慶豹

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內容摘要：本文以詮釋學的「效應歷史」的角度，描述法蘭克福學派或批判理論在台灣在接受過程。法蘭克福學派在台灣在接受與上世紀八零年代台灣民主運動息息相關，他不僅表現為一種對黨國資本主義統治或意識型態的批判，並展開以公民社會為訴求的思想運動。

本文一方面陳述了台灣學界的法蘭克福學派研讀，另一方面呈現出學術與現實的高度結合，尤其是當台灣國家機器反共（產主義）、恐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與思想成了一种思想的武器，以對抗統治意識型態，形成的一种有趣的面貌。

關鍵詞：批判理論、民間社會、公共領域、馬克思主義、民主

壹、前言

Hannah Arendt 說過：「所有出現在人類社群中的必要活動，只有兩種被視為是政治的，並且組成了亞里斯多德所謂的『政治』，它們是『行動』和『言說』，兩者是展現於人類事物的領域，並且除它們之外，所有其他的活動，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需要或有用而已。」¹這即是對政治生活所做的最為簡明的定義。台灣已經擁有在「行動」和「言說」方面的經驗，這個經驗是政治的，它表現為「自由」，這正是政治存在的理由，也是政治生活所追求的。「法蘭克福學派」以「新左派」或「新馬克思主義」之姿出現在台灣學術舞台上，在那個追求「真正的政治生活」的年代裡，

* 本文於 2008 年 9 月 25-28 日間以 *Die Wirkungsgeschichte der Kritischen Theorie- Die Rezeption der Frankfurter Schule in Taiwan* 為題，於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主辦之「批判—理論—批判理論：法蘭克福學派在中國的影響」會議上發表。感謝本刊匿名審查委員指正。

¹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24-25.

因為在國民黨「恐共（產主義）」和「畏馬（克思思想）」的環境底下，閱讀批判理論的作品，是帶有反抗和追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強烈暗示的，它成了突破「黨國意識形態」的象徵，也成了見證「公共論述」（public discourse）是否可能的檢測劑。

作為一股思想潮流，法蘭克福學派在八〇年代台灣的公共論述中被接受或理解，最初是以「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主義」、「新左派」的標籤或背景底下出現的。²「批判理論」像是一個通俗性的稱呼，概括了那個年代知識分子批判意識的抬頭，「批判」成了反抗的「理論」，也成了一種對於獨裁政體的反抗的表現。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早期介紹批判理論的學者主要是從事研究「共黨理論」或「中國大陸研究」背景居多，他們主要協助政府對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意識形態進行研究，其職責即是針對那些帶有與「馬克思」思想具親緣性的思想的關注，因此他們的文章主要是把批判理論放在「左派」的位置上來理解，而且還略帶「批判」的任務，儘管他們並不一定是從一種「右派」的立場出發。³

雖然歐洲在二戰以後就出現了各式各樣有別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不管它叫著「新馬克思主義」或「西方馬克思主義」，台灣在八〇年代中期以後才開始認識的「批判理論」則是取徑美國「新左派」運動的背景來接受的。時值民間或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法蘭克福學派進入台灣學界，不僅表現為「他者」，亦表現為「異端」。

八〇年代中期的台灣，隨著社會反抗意識和民間運動的蔓延，「地下書店」老板選擇偷偷地「盜版」批判理論英譯本之作，大學新進的老師開始在「當代西方社會哲學」的名義下教授諸種「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這些思想被當時極右的《台灣

² 高宣揚於 1984 年在港台流傳的一本書叫《新馬克思主義導引》，內容即是介紹「批判理論」的思想家霍克海默、阿多諾、哈伯瑪斯，甚至還包括盧卡奇在內。追本溯源，最早對馬庫色（或譯為馬孤哲）的思想與西德學運介紹到台灣乃為當年執教慕尼黑大學的洪鍊德教授，即發表於 1971 年的《東方雜誌》上。之後，洪教授也出版了《傳統與反叛——青年馬克思思想的探索》（1987）一書，把影響其後帶有新馬和文化批判理論的西馬，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均有系統地介紹，該書之前以《現代社會學導論》（1972）為名隱身於後，其內文就已列專章討論知識社會學與意識形態，應該是批判理論的肇始。

³ 學者中包括姜新立、陳章津、李英明等人，他們當時都是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或東亞研究所的研究員，之後則有宋國誠等人。最早發表的論文包括姜新立〈法蘭克福學派與批評理論〉，刊於《共黨問題研究》第六卷第六期，1980 年 6 月、李超宗〈西方馬克思主義〉，刊於《復興崗論文集》第三期，1981 年 3 月。陳章津主持過一個「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遠流出版社）。

日報》警告「嚴防新馬克思主義借屍還魂」。知識分子群體中企圖通過對「他者」與「異端」的承認，嘗試一種從閱讀中達到反抗的快感，代表著「獨立思考」，不再依偎於權威，以作為表達根本就不相信「黨國機器」的那套意識形態宣傳。

總之，就當時的歷史情境而言，批判理論是作為一種「西方的理論」或「西方當代思潮」的面貌出現的，它作為「西方」的「社會科學」，當作一種「新知」或「有待引荐」的方式被接受；⁴但是，由於批判理論一開始就被標籤化為「新馬克思主義」的一支，對於當時的「政治正確」而言，它難免被人說成有「為匪宣傳」⁵之嫌，甚至某種程度上是具有危險性和有害的。⁶

貳、引介法蘭克福學派

法蘭克福學派以「作品」的姿態出現於台灣的學界，人們對它的接受，即是代表對它的理解，或者，對它的理解，總是在一種特定的歷史意識底下進行著，不管我們是否可以說它作為一種「應用」(Anwendung)，它就是詮釋學所言的「效果歷史」(Wirkungsgeschichte)，正如 Gadamer 所言：「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種效果歷史事件」。⁷

從台灣的學術情境看來，之所以對批判理論產生興趣，主要還是取徑於馬克思和韋伯兩大思想家，前者是在一種「反共教育」之下形成反面的「好奇」，後者則是在「經濟起飛」的背景下形成社會「反思」力量。批判理論作為「新馬克思主義」思想來理解，即是強調其左派的理論色彩，當作一種政治立場或態度，而不是把它僅僅視作為「社會科學」；另一面受到韋伯的影響，批判理論則成了在「現代化」的語境中理解成對「現代性」進行反思的思想潮流，以力求一種更為理性化的資本

⁴ 黃瑞琪即是把它說成是一種新興的「社會學理論」，見《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6，頁3。

⁵ 在那個年代，國民黨把中國共產黨叫作「共匪」。「匪」指的即是盜賊，表示他們不僅不具有政權的正當性，也暗示其所作所為極為低劣，就此國民黨失去大陸等於是被「盜匪搶走」一般。

⁶ 當時擔任過教育部長的李煥，於1987年8月17日突然在國民黨的中央總理紀念會上對於知識分子圈中流行的「新馬克思主義」現象表達了憂心，認為該黨有必要引導知識分子免於「誤入歧途」，甚至指稱此種思想為「落伍的」，應在校園中予以嚴正的撻伐。見洪鑣德〈新馬克思主義在台灣〉，收入氏著《新馬克思主義和現代社會科學》，台北：森大圖書有限公司，1988，頁200。

⁷ Gadamer, WM I:305.

主義生活的到來。前者以「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或「東亞研究所」為主要陣地，後者則是在東海大學高承恕教授帶領一批學生勤讀韋伯著作之下，再延伸到批判理論，把它當作「社會科學」的理論來研究。因此一開始，社會學界、政治學界，甚至是新聞學界、教育學界，對於批判理論的興趣明顯地比哲學學界更濃，這也反映了批判理論的思想特性以及台灣哲學界的學術生態的思想鴻溝。⁸

隨著台灣現代化的經濟起飛，韋伯學的資本主義研究成了一個特殊的標的，以作為反思現代化所帶來的社會後果和現象。台灣學界對於「批判理論」的接受，並不同於它在歐洲誕生時所理解的那樣，把它看作是啓蒙方案的置疑（霍克海默、阿多諾）或現代性的批判（馬庫色、哈伯瑪斯），因為對一個面對無可逆轉的現代化的台灣讀者而言，面對現代化的苦果，環境、勞動、住屋等都成為抗爭的主題，這時流行「自力救濟」的口號，尤其地表現在於訴諸：「政治如何更加民主、言論或思想如何更自由」，以反映現實社會不同階層所面對的難題。

這樣，一種對於「公共性」的訴求和覺醒可能成了台灣學界理解新馬克思主義或批判理論最具「實踐」意義的事。按我的理解，把批判理論視為是韋伯思想的推進者，並且是作為反思現代化後果最為直接可「挪用」的理論，批判理論的思想資源也就成為對社會病症與危機的一種診斷或描述，因此不難理解，整個法蘭克福學派被引荐之際，哈伯瑪斯的思想就占盡了上風，學界並沒有特別強調從馬克思主義思想有何繼承和批判的關係來理解，因為他們更多關心的是如何從對公共性的諸訴求中進而實踐公民的社會扮演；或者說，對一個已然進入「發達工業社會」（馬庫色）的台灣，它正面臨一種社會矛盾或問題開始尖銳化的時刻：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雖然沒有社會主義或左派的深厚土壤，批判理論的學術詞語仍一定程度地成為分析現實的武器，於是在一般出版物中「批判」一詞漸漸流行起來，畢竟這個十足「共產黨」的語言，台灣社會對它的「接受」代表著一種「效果歷史事件」。

正如 Habermas 所言的：「一旦私有化的個人停止僅僅對他們的主體性進行自我

⁸ 從台灣學界對於批判理論的接受史來看，哲學界和社會政治學界的距離還是相當遠的，哲學界對於現象學的研究興趣較高，然而，對於帶有社會批判或馬克思思想背景的批判理論，則相對冷淡。於哲學系任教的陳文團（Tran Van Doan）教授出力最多，有趣的是，在他指導下撰寫批判理論的碩博士論文，主要還是政治系或社會系的學生。我的觀察是認為，這與傳統中國哲學過分封閉於「心性」的探討有關，不管是政治哲學或社會哲學，在中國哲學傳統中一直都是邊緣性，因此，在廣大的讀者當中，他們所認為的「哲學」就是「人生哲學」，所謂的「哲理」都是一些「做人的道理」。直到今天，台灣哲學界對於批判理論的研究還是沒有太大的起色。

溝通，更進而發揮私有財產者的能力，去影響有關共同利益的政治權力，則文字公共領域中的人文性會增加政治的公共領域的有效性。」⁹的確，台灣社會爭取民主化首先即是要取得言論上的自由，能夠自由地閱讀任何一種書籍，尤其是被定義作「共產」或「馬列」之類的著作可以獲得公開講述，即是突破了基本的防衛，形成最具象徵意義的政治轉化力量。政治的公共領域（政黨）起源於文字的公共領域，國民黨遷台以來，各種帶有批判性的刊物沒有少過，像《自由中國》、《美麗島》等即是最具代表性的，生產不同的觀點和公眾質疑的能力。對此，通過「文字公共領域」（出版物）不斷的衝撞，加上新的社會權力又不斷的重整和散佈，國家機器成了批判的對象。

“Civil Society”(Bue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詞在台灣有多種譯法，包括市民社會、民間社會、公民社會等，但又以「民間社會」的接受度相對高些。翻譯本身即是帶有歷史實踐性格的挪用，台灣所理解的「民間社會」，主要是指一種與「政府」或「國家」相對的民間或非官方的力量，或者它也可以指向一種私人的或公共的領域。因此，這個詞的出現是與「公共領域」一同出現的，兩者聯結起來就帶有一種強烈的對抗意識，代表一種力量的追求與形成，明確地把它理解為「自由」和「民主」的標誌，所以非常清楚的是，民間社會的自主性取決於公共領域的自由程度。民間社會的力量即是要爭取更多表現於行動和言論上的自由與民主。¹⁰

當時所有參與反抗運動的人都了解到，國民黨及其資本主義結構是一個龐大的機器，要成功的反抗它們確實是不容易，於是形成了「民間社會」這樣的論述，目的是整合所有小眾或邊緣的力量，將消費者、環境保護、勞工、婦女、原住民、農民、學生、教師人權、無住屋者等不同訴求的運動團體集結起來。¹¹毫無疑問的，在「國家—社會」的分析架構下，「民間社會」成了具有對抗性的政治論述（discourse），一種由下而上的激進思維進路由此誕生，正如南方朔所言：「民間社會的提出，基本上將原有的社會秩序做了一個顛倒，然後肯定另一種新的歷史詮釋。它不再看重既有統治者的歷史功能，而看重人民對歷史的創造功能」¹²。

⁹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55-56.

¹⁰ 《南方》雜誌對於「民間社會」的鼓吹最為賣力，一開始就帶有標示清楚為反國家霸權、反資本主義霸權為核心，在當時算得上是最激進的刊物，且最具實踐性格，作者包括南方朔、木魚、江迅等人。也參見蔡其達：〈打開「民間社會」史——一個反宰制論述的考察〉，《中國論壇》第 336 期，1989/9/25。

¹¹ 見張茂桂：《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台北：業強出版社，1994，頁 20-27。

¹² 南方朔：〈如何看待民間社會〉（座談會），刊於《中國論壇》，第 336 期，頁 22。

事實上，公民社會的形成有許多條件，一方面依賴相互論辯與容忍異己的精神，發達的傳播媒體與法律規範建立等；另一方面則需要社會強烈的自主意識和高度的文化生活，以及文化再生產的管道。因此，法蘭克福學派在台灣的接受史中，明顯的與公民社會的變化有關，正如公共領域所追求享有自由和自主性，批判理論即是作為一種用以對抗壟斷和宰制的思想武器，特別是教育的鬆綁以及學術自由的爭取。尤其明顯的是，教育學界的教育理論或哲學專著出版（楊深坑、陳柏璋）以及碩博士論文的撰寫，在對批判理論的應用或理解方面，在數量上都比起其他的學科多，他們對批判理論的興趣即是放在意識形態批判的脈絡下來理解，「教育」無疑的即是執行意識形態最为核心的地帶，這說明了「公共性」的追求首先必須質疑的當然是「教育」這個最強固的意識形態宣傳機制，不管是教育行政、師資養成、課程教本等，都必須面對被質疑或挑戰，批判理論成了一個尤其必要被「引荐」的「理論」。¹³

參、反抗異化

國民黨自 1949 年撤離大陸遷台，就頒布「懲治叛亂條例」，並加重「刑法一百條」之內亂罪之處罰，其刑度為唯一死刑。「懲治叛亂條例」是針對共產黨而制定的政治特別刑法，以軍法秘密審判之方式來懲處「與共產黨有關」或「政治異議」分子，視他們為叛亂犯，屬於內亂罪；「刑法一百條」更是明確規定「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¹⁴

究竟如何界定「著手實行意圖顛覆政府的行為」是成問題的，因為任何以和平理性且合乎民主憲政精神的反政府言論和行動，都可能被定為內亂罪，這就是典型的「白色恐怖」，特別是言論和思想方面的自由，基本上並沒有太大的保障。就在這樣的政治氛圍底下，台灣社會必須首先突破這個根本的魔咒，民主自由才可能向前邁進。

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更加嚴格地實行「思想教育」，任何與國民黨政府的「領

¹³ 相關的著作包括由師大書苑出版的：楊深坑：《溝通理性·生命情懷與教育過程：哈伯瑪斯的溝通理性與教育》（2000）、楊深坑：《理論·詮釋與實踐》（1998）、陳柏璋編《意識形態與教育》（1988）、吳根明譯：《批判理論與教育》（*Critical Theory and Education*, Rex Gibson, 1988）等。

¹⁴ 林山田：《抗爭 100——廢除刑法第 100 條抗爭扎記》，台北：自立晚報社，1991，頁 26。

袖、主義」（「三民主義」和「國父思想」為大學的必修課）意識形態不相符者，都可能被打成「中共同路人」，各級政府和學校的公文袋上都印有白色恐怖般的字句：「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廣告詞也提醒人們：「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當時大學的軍訓教官即是扮演著學生「思想及生活」的檢察人員。

由於極端的「恐共」，視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為「禍國殃民」之物，所有任何提及「馬列毛」思想的著作，都可能被定罪作「為匪宣傳」。因此當「批判理論」被理解作「西方馬克思主義」或「新馬克思主義」時，其命運可想而知，然而越是受到「特別關注」，在大學的課堂中越是吸引學生，對於它們閱讀的興趣，也造就了地下的「盜版書」出版，尤其使人更加喜好任何與「批判」相關的書籍，在台灣大學附近的一間「地下室書店」，我們可以輕易地購買到霍克海默、馬庫色、哈伯瑪斯等人的英文譯著。

在校園內，由於長期對於國民黨的「黨國意識形態」教育的質疑和反抗，經「黨外」活動的漸起，到學生「野火集」的蔓延開來，直到發生警備總部人員進入校園（清華大學）逮捕兩名研究生，民間的反對力量，通過校園訴求民主自由之聲的集結，可謂到達頂峰。其中，以學運團體的「野百合運動」集結成目標號召「廢除刑法一百條」的運動最具代表性，訴求從「思想自由」到「言論自由」，於是逐漸形成「民間社會」的論述以對抗國家機器的霸權，在「支配／反支配」的論述之下成了一個最為醒目的標誌。

雖然 1986 年已宣布解嚴，但國民黨仍統治了主流的媒體，大學學術和出版也同樣受到限制，任何與其「領袖」或「主義」相左的，都一併視作為敵人：「中共同路人」，不是漢奸就是走狗，早期連台獨分子也被視為是「共產黨人」。

就批判理論的關鍵詞方面來理解，意識形態（ideology）、異化（alienation）、宰制（domination）、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市民社會等是最常被提及的。這些關鍵詞在此都有其「效應歷史」的作用，挪用至知識分子的公共論述中。尤其是「意識形態」一詞，在國民黨的教育裡，它是用來指斥「共產主義」的代名詞，但是在民間或學院的反抗運動及批判訴求中，則是指國民黨「統治人民思想的工具」，無論從何種角度而言，「意識形態」都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字，國民黨視為與之「主義」對立的東西，在反抗運動中，意識形態則是「國民黨專制統治」的代名詞。可見，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要借助於左派的論述語言是非常艱難的，但是，越是如此，越可以檢證其具體的成果，同時也可以作為批判的武器，包括「意識型態」這個字眼，其具體指涉的對象即是國民黨的「統治」和「宣

傳」，代表著國家機器壟斷和宰制的力量。¹⁵

在那個年代裡的台灣，「異化」一詞有兩個意涵，一是指「喪失獨立思考能力」，另一即是指「統治或奴役」。所以這個詞仍然是一個「批判理論」的概念，它代表的即是與「自由」相對的東西，大學在國民黨的「主義」教育下，結果是造就一群「喪失獨立思考能力」的學生，同時，「主義」即是帶有統治和奴役的作用的，因此思想的傳播和吸收首先必須經由在「黨國——主義」的正當性之下獲得允許才是可行的。

同時，「異化」這個詞基本上又與「文化工業」一詞的用法相似，它無外乎即是指一種沒有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情況之下，大學無發展學術的自由，其結果即是學生沒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相對的，也自然容易淪為國民黨宣傳和洗腦的有利條件，教育就成爲一種「奴化」。說到底，從「教育」到「媒體」，都是國民黨的「文化工業」，生產「忠於黨國」、服從「主義領導」，以此「思想機器」鞏固其統治的正當性地位。

政治生活的自由和民主，最直接表現即是對於媒體自由的訴求，一方面是打著「公共領域」的合理性旗號，同時，即是通過黨政軍退出媒體的訴求來實現「民間社會」的到來，所以不管是意識形態或是文化工業等指責，都是帶有批判理論的色彩在內。¹⁶總體而言，上述語詞的挪用，都可以直指這個時期的國民黨政府所面對的即是「統治的正當性危機」問題。

肆、出版作為一種論述實踐

綜合上述所言，批判理論在台灣的接受史，不管是學院或非學院的，都是一種實踐的結果，當然，爲何那個年代如此猖獗地「盜版」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或翻譯何種介紹該學派的著作，都屬於一種「實踐」。毫無疑問的，不管是選擇「盜版印刷」批判理論這類書，或是那些代表性的刊物刊行了與批判理論有關的思想，或者是那些市民社會的運動中對於批判理論一些話語的「挪用」，都代表著某種理解在其中，而且這樣的理解背後又帶著無法否認的歷史情境，正如 Gadamer 所言：

¹⁵ 「民間社會與台灣發展」，《中國論壇》，第 336 期，1989/9/25。

¹⁶ 張錦華：〈從公共領域理論及多元化報導觀點探討我國選舉新聞報導〉，刊於《新聞學研究》第五十五集，1997 年 7 月，183-202。最早提及批判理論與新聞學或媒體研究相關的著作爲：黃新生著《媒介批評——理論與方法》，台北，1987。

每一翻譯者的任務不只是重新給出他所翻譯的那位討論對手所真正說過的東西，而是必須用一種在他看來對於目前談話的實際情況似乎是必要的方式去表現這個人的意見，在這種談話裡，翻譯者只把自己處理為兩種討論語言的認識者。¹⁷

據了解，對於批判理論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1980 年，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溝通與批判》，作者為當時的研究生黃瑞祺。我們尤其應該注意到黃瑞祺的導師高承恕，他是一位韋伯學專家，基於其社會學背景，他在東海大學帶了一批學生做韋伯研究（翟本瑞、王振寰、張家銘等），他所關注的現代化問題成了引導其研究生跟著注意到批判理論及哈伯瑪斯思想之研讀，當然他們的問題意識仍然是「社會學理論」的面向居多。

學界最早比較全面引荐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是一位法學家吳庚教授。吳庚畢業於德國，學術背景起源於韋伯的研究，轉而推進到相當程度受到韋伯影響的批判理論之研究，〈當代批判理論的貧困——法蘭克福學派的興起及終結〉一文後來刊於台灣大學《社會科學論叢》，1984 年 12 月，第 32 期，這個研究是在國科會的研究經費補助下進行的。在之前，他另外還有一篇國科會研究論文報告〈哈伯瑪斯的政治社會學批判——兼論法蘭克福學派〉（未刊稿，1983 年 3 月）。

1985 年，由東海大學哲學系出刊的《中國文化月刊》連刊了由蔡耀明翻譯 Leszek Kolakowski 在《馬克思主義流派》（*Main Currents of Marxism*）第三卷第十章的內容（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Critical Theory”），¹⁸算作可以提供學界從西方學者那裡比較全面了解法蘭克福學派的文章。1984 年，《法蘭克福學派》（桂冠出版社）一書翻譯出版，作者為英國一位長期研究社會主義思想的學者 Tom Bottomore，這可能是台灣最早一本介紹批判理論的譯作，由於這本書比較容易流通於坊間，其「效果歷史」比學報論文更顯著。

礙於語言上的困難，早期台灣吸收批判理論的思想主要依賴於英美學者的著述與翻譯，加上外國圖書不易流通購得，仍借助於「盜版」的印行而獲得，包括 *Critical Theory*,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gative Dialectic*,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等等；另外英美學者論及批判理論的書籍，又以 David Hel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唐山出版社），Raymond Guess, *The Idea of A Critical Theory*（雙葉書

¹⁷ Gadamer, *WMI*: 313.

¹⁸ 共計連刊出七期，從 69 期至 75 期，日期為 1985 年 7 月至 1986 年 1 月。

廊), Thomas McCarthy,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ürgen Habermas* (唐山出版社)等為主。¹⁹ 這些書都決定著那個年代我們對於批判理論或哈伯瑪斯的理解。

創刊於 1957 年的《文星》，第 118 期出版的封面人物，以「哈伯瑪斯——社會哲學的百科全書」為標題，如編輯室報告中所言：「介紹、剖析當前世界人文科學的思潮趨勢，……選擇了社會哲學一代宗師、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哈伯瑪斯，作為本期的封面人物」。²⁰

1986 年，一本兼具學術性和通俗性的綜合性月刊雜誌誕生，名為《當代》(Contemporary)。《當代》月刊「創刊號」介紹的人物是傅柯 (Foucault)，標題作「瞄準當代的中心——米修·傅柯」，這個標題即是取自於一篇哈伯瑪斯記念傅柯的文章標題，這篇文章也收入在該期中。²¹從該期專輯的「引言」來看，傅柯是作為一位「批判理論」的思想家來引介的，其中仍是瞄準著「權力」與「生活的危機」問題做出思考，可以看出當時台灣的知識氛圍，主要是在「批判」的意識底下推進的。

我們必須留意到解嚴前後台灣比較引人注意的刊物，除了《文星》和《當代》(都曾做過霍克海默、阿多諾、班雅明的專輯)更多在社會議題上予以討論和思考的大眾雜誌主要有兩份：一是清楚標誌著自由主義學者主導的《中國論壇》(聯合報基金會出版，該刊可以視為是《自由中國》的延續，與後來形成的「澄社」組織息息相關)，另一則是代表著少數獨立知識分子民間反抗運動的《南方》；前者以主流的學者居多，態度比較溫和，後者則是以民間或「黨外人士」為主，屬於激進的社會實踐路線。

伍、未來的接受史

台灣把對「批判理論」的接受，當作「反抗」國民黨統治的一個思想工具，它成了一個思想自由或言論自由的溫度計，以測量社會的民主化程度。因此，在批判理論的眾群星中，哈伯瑪斯的思想的接受程度是遠遠超過其他法蘭克福學派之成

¹⁹ 除了外文書的盜版，大陸學者的書也屬於「盜版」之列，尤以徐崇溫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最為普及。

²⁰ 1988 年 4 月 1 日。《文星》停刊三次，共出版了 120 期，最後一期為 1988 年 6 月。

²¹ 1986 年 5 月 1 日。《當代》月刊發刊歷經兩次停刊又復刊，至今已出版了 238 期，2007 年 9 月。

員的，這個現象不僅僅是說明了通過美國學者對哈伯瑪斯的引荐比較容易理解，更重要的是，台灣面對的是一個「社會批判力」逐漸抬頭的時局，更多人關心的是如何在業已「現代化」的步伐下，同時走向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尤其是哈伯瑪斯所堅持的「溝通理性」和「啓蒙精神」，正是這個移植西方社會生活的台灣所需要的，特別是「公共」意識的形成；無論如何，政治民主化和市民社會的反抗運動，都與對批判理論的理解並進，哈伯瑪斯則是理解為一個「現代性」的推手或實現理性化的思想家代表。

因此，學界對於法蘭克福學派中相對比較具有「馬克思主義」元素或是對於啓蒙傳統（包括科技主義和實證科學）予以強烈批判的，都未有重大的研究成果，在那個科學哲學同樣興盛的時期，波柏（Karl Popper）獲得明星般的介紹，但卻對於阿多諾和哈伯瑪斯與之爭辯之事未曾予以足夠認真的對待。

由此可見，台灣學界並未深入於了解批判理論的傳統，以及其對抗啓蒙或現代性方面所做的深入理解。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對於霍克海默的研究最少，對於阿多諾的研究限於美學方面的思想（陳瑞文），本雅明的研究在文學界中被當作一種文藝批評加以理解，神學方面也做了一些些（曾慶豹）。當然，「馬庫色」的名字，一如他在 70 年代歐美的學生運動的勢頭（3M）中的地位，在台灣他也是一個比較容易被學生運動者接受的對象，只是人們並不是關心「科學意識形態」下的異化問題，而是擔心被國民黨教育下形成的「單面人」。²²

基本上，台灣學界在引用或挪用批判理論時，主要還是放置於對「公共性」的訴求上，特別表現為一種「自由主義」方式的法蘭克福學派。也因為這樣，哈伯瑪斯在台灣的接受程度還是遠遠地高過於其他的思想家。從過去二十年的研究累積成果看來，對於批判理論的基礎研究極為薄弱，絕大部份所做的都是一種「挪用」，「挪用」到教育、文學、媒體、社會、大眾文化等等，除了哈伯瑪斯的基礎研究算是做了一些，其他的，特別是針對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個別經典著作的深入探討和研究，仍有待加強。

由於台灣學者對於批判理論的興趣主要與推進現代化的問題有關，因此不管是從新馬克思主義或是韋伯這條進路切入，都與如何促進台灣社會走向更為理性化的關懷息息相關，因此，相較之下，對哈伯瑪斯的理解和吸收，也就更甚於其他的思

²² 通過《南方》雜誌出版了「新學問叢書」系列，主要都是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著作為主，馬庫色和弗洛姆的書則是他們有出版興趣的。馬庫色的書同樣對學生運動有著奇特的吸引力。

想家（霍克海默的研究最弱，至今還沒有一篇國科會研究計劃或碩博士論文以他為研究對象）。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台灣可以說是一個最為忠實且不斷應證哈伯瑪斯公民社會理論的地方，貫徹啓蒙「未完成的方案」，可惜截至目前為止，哈伯瑪斯仍未造訪過台灣，儘管他曾應允受邀來台，出於種種因素前後取消了兩次來訪計畫。

由於缺乏「左派」的傳統，並以強化西方現代化的目標前進，經濟起飛之下所關心的是如何同時實現自由和民主的政治生活，對抗國民黨或專制統治成了「批判理論」吸引人的地方，「批判理論」被理解成了推進現代性的思想力量之一。²³由於缺少像阮新邦的《批判理論、社會實踐與香港困境》、黃宗智的《公共領域與中國社會》等那樣的研究，我們尚未看到類似「批判理論與台灣」的研究成果。這也就證明，台灣學界對於法蘭克福學派的接受史是那麼徹底的挪用，以致於批判理論的研究成果也就顯得比較支離破碎，尚未出現如在美國學者中的 John Keane, Fred Dallmayr 等明顯受到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影響的人物，也許只有出現相似於「繼承者」角色或「發揚者」之類的學者時，法蘭克福學派在台灣的接受史才算得上是成功的。

陸、結語

1990年，馬克思三大卷的《資本論》連同《1844年哲學——經濟手稿》，一同由時報出版公司印刷公開發行，這是一次極為突破性的舉動，是台灣學術界極具象徵性的大事。就整個國際的大氛圍而言，正是東歐蘇聯等共黨國家發生巨變的時期，那一場特別主辦的「發表會」，宛如一場對馬克思的「哀悼」，但同時也是對當時的執政者帶有「示威性」的表達。猶記得當時的大學生學術社團躲在「國父思想研究社」裡組讀書會、辦演講、發行刊物，以具「紅色」思想特色的題目最為吸引活躍份子，強調其「人道主義精神的馬克思主義」，也強調其為「大學生批判性格的思想表率」，其中以閱讀《1844年哲學——經濟手稿》為號召，把大學教育與黨國意識形態宣傳理解為「異化」或「物化」。

而今，台灣已經民主化了，一切的思想也都解禁得如此徹底，反而，批判理論更加「學院化」，離人們的真實生活更遠了。然而依然值得慶幸的是，批判理論曾經

²³ 陳忠信：《國家政策與批判的公共論述》，台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1989。本書對於「國家」理論的論述主要受到 Offe 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哈伯瑪斯《合法性的危機》不也是在 Offe 的影響之下形成的嗎？

在台灣的民主化歷史中有過一種極為微妙的角色扮演。

參考文獻

- 吉普森：《批判理論與教育》，吳根明譯，臺北：師大書苑，1988。
- 林山田：《抗爭 100——廢除刑法第 100 條抗爭扎記》，臺北：自立晚報社，1991，26。
- 洪鎌德：《現代社會學導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 洪鎌德：《傳統與反叛—青年馬克思思想的探索》，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洪鎌德：《新馬克思主義和現代社會科學》，臺北：森大圖書有限公司，1988，200。
- 高宣揚：《新馬克思主義導引》，臺北：遠流出版社，1995。
- 黃瑞琪：《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86，3。
- 黃新生：《媒介批評——理論與方法》，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0。
- 陳伯璋編：《意識形態與教育》，臺北：師大書苑，1988。
- 陳忠信：《國家政策與批判的公共論述》，臺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1989。
- 楊深坑：《理論·詮釋與實踐》，臺北：師大書苑，1998。
- 楊深坑：《溝通理性·生命情懷與教育過程：哈伯瑪斯的溝通理性與教育》，臺北：師大書苑，2000。
- 張茂桂：《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臺北：業強出版社，1994，20-27。
- 李超宗：〈西方馬克思主義〉，《復興崗論文集》，第三期，1981年3月。
- 姜新立：〈法蘭克福學派與批評理論〉，《共黨問題研究》，第六卷第六期，1980年6月。
- 南方朔：〈如何看待民間社會〉（座談會），刊於《中國論壇》，第336期，22。
- 張錦華：〈從公共領域理論及多元化報導觀點探討我國選舉新聞報導〉，刊於《新聞學研究》，第五十五集，1997年7月，183-202。
- 蔡其達：〈打開「民間社會」史——一個反宰制論述的考察〉，《中國論壇》，第336期，1989/9/25。
- 「民間社會與台灣發展」，《中國論壇》，第336期，1989/9/25。
-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55-56.
-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24-25.

Hans-Georg Gadamer, *Hermeneutik I, 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Gesammelte Werke, Band 1*, Tübingen: J.C.B, Mohr, 1986.

初稿收件：2009年04月03日

審查通過：2010年04月28日

責任編輯：劉耀仁

作者簡介：

曾慶豹：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

台灣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通訊處：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200號 台灣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

E-mail：chinkenpa@yahoo.com.tw

The Effective History of Critical Theory: The Reception History of Frankfurt School in Taiwan

Chin Ken Pa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Religio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is from the “effective history”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describes the reception process of Frankfurt School or critical Theory in Taiwan. the reception of Frankfurt School in Taiwa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 Taiwan during the 1980s. Not only does it represented an ideological critique of party-state capitalism regime, and develop an intellectual movement that appeals to civil society.

This essay on the one hand presents intellectual readings of Frankfurt school in Taiwan,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presents a highly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reality, especially when the state apparatus is anti-communism, fearful of Marxism, the Frankfurt school's ideas and publications constituted a kind of intellectual weapons, resisting or confronting ideology of the ruling power, composing an interesting contour.

Key Terms: Critical Theory, Civil Society, Marxism, Democracy, Public Sphere